



重庆巴蜀中学
BASHU SECONDARY SCHOOL

校史

（公正 诚朴）
1933-2013



2013年版

编委会主任：王国华 傅唯泉 张 勇

编 委：吕之生 舒义海 余 赢 费春斌 吴国慧 唐良沐

邓 飞 汪红霞 付 英 张 勇 夏义勇

编 辑：重庆市巴蜀中学校行政办公室

其他编校人员：见后记

《重庆市巴蜀中学校校史》序

功业八秩 文脉相承

卢晓钟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校史，是一所学校发展变迁的见证，是一所学校借往察今的镜鉴，是一所学校通往辉煌明天的奠基。

2013年，屹立于两江潮头的巴蜀中学将迎来她八十周岁的华诞。这所为重庆乃至全国输送了大批杰出人才的名校已在一代代勤勤恳恳的园丁的辛勤耕耘中书写了八十年的历史。八十年里，我们的文化得以传承，人文得以彰显，教育得以发展，都离不开基础教育的默默奉献。值此巴蜀中学沉淀撰史之际，欣闻盛事，受邀作序，畅然为之。

筚路蓝缕，创业维艰。20世纪30年代的重庆，在整个时代大背景的裹挟中负重向前。巴国渝都，生灵涂炭，狼藉到处，伤痕成片。当时，重庆的教育水平相当低下，老百姓处在物质、精神双重匮乏的肇始之初。教育救国，成为那个时代一些有识之士的梦想。旅居渝州的王缙绪将军毕生受教育恩惠，颇感唯有振兴教育，方能救民水火，开化万端。于是他毅然决然地做出了“投笔从戎，兴教救国”的决定。尔后江苏省著名教育家周勛成先生受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力荐，赶赴重庆，涉事兴教，为当时阴霾中的渝中半岛投出了一丝光亮。功在千秋，光耀后人。正是这一束星光，积少成多，汇成星河，至今仍照耀着巴蜀大地这片热土上的辈辈学子启智求真，造福社会。

栉风沐雨，守业更难。建校之初的巴蜀，获赠国府主席林森亲题“成绩斐然”的牌匾。然而，与风生水起的阶段性办学成果相伴的绝不是无虞的坦途。抗战时期日寇的频袭，建国初期的百废待举，动荡年代的曲折前行……

无一不为巴蜀的前行加上了沉重的负担。“守业更比创业难”。周恩来先生在巴蜀操场的演讲；邓小平“只许办好”的批示；改革开放后政策的支持……都为代代任重道远的巴蜀人增添了前行的勇气。巴蜀人，在蜿蜒曲折的路途上，迎难而上。她的目标，永远指向巅峰所在的方向。

文脉相承，继往开来。80年厚重历史的积淀，不是轻描淡写的过眼云烟。这80年的功业需要凝结多少人的智慧、汗水、辛劳甚至是血泪与生命啊！“千顷波浪兼天涌，雄吞双江入胸中。”巴蜀，始终岿然从容地凝视着嘉陵长江，坐看八十年沧桑变幻，波起浪溅，潮落潮涌。

不管曾历经多少荆棘与坎坷，不管曾铸造多少辉煌与成就，也不管前途等待的是迷茫或光亮。当清晨的朝霞洒满渝州半岛，我们仍旧可以清晰地看到那坚挺着的“公正诚朴”的脊梁，正以经风历雨的从容与青春正茂的神采迎接崭新的朝阳！

汪晓敏



第一篇

1933
/
1950
年

第一篇

1933~1950年

BASHU SECONDARY SCHOOL



重庆巴蜀学校迄今已有八十年历史，是社会各界历来公认的中华名校之一。巴蜀学校的创办，在当时是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寄托着创办人王缙绪先生“教育救国”的理想。从1933年创办，到1950年底西南军政委员会接办，巴蜀学校属私立性质，共计十八年。这段时期，中国经历了多年战乱和重大社会变革，在教育家周勛成先生和一大批优秀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巴蜀学校发展成为集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完整基础教育体系的完全学校，并积极筹备建立巴蜀文商学院，其办学成绩享誉西南，驰名全国。

巴蜀学校秉承“公正诚朴”的校训，创设“手脑并用”的教育目标、“儿童本位”的教育原则及“教养兼施”的教育模式，是中国现代教育理

论在西南地区的成功实践典范，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了数以千计各界精英，造就了无数栋梁。周勛成先生是巴蜀学校这一时期的校长，为这所学校的创设和发展付出了他一生最大的智慧和心血。他所具有的先进教育理念和富有创新的教育实践，使巴蜀学校迅速成为名校，为巴蜀学校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巴蜀学校成功的新教育理论实践，至今仍产生深远影响，在其后各个时期创造的辉煌中，依然闪烁着巴蜀学校早期教育理念的光芒。

本篇将巴蜀学校1933年至1950年间的历史分为三章予以记叙：第一章“创设初期成绩斐然”（1933.2—1937.7）；第二章“国难时期艰苦办学”（1937.8—1945.9）；第三章“复员时期恢复发展”（1945.10—1950.12）。

第一章

【创设初期 成绩斐然】

1933年2月~1937年7月

BASHU SECONDARY SCHOOL

1933年2月至1937年7月，是巴蜀学校初创阶段，周勛成校长将这一时期称为巴蜀学校的“极盛时期”。这个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筹备阶段，一是初创阶段。

巴蜀学校的筹备长达三年多，为巴蜀学校创立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人才基础和组织基础。1929年，创办人王缙绪先生筹备创建巴蜀幼稚园，购买园址，修建园舍；1932年8月聘请周勛成先生来校担任校长，发表《巴蜀宣言》，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员；经过七个月的周密准备，1933年2月12日正式开课。

初创阶段，则从1933年2月正式开学到1937年7月抗战爆发前共四年。巴蜀学校确定了“手脑并用”教育目标、“儿童本位”教育原则和“教养兼施”教育模式，其教育

实践很快赢得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取得实际办学成效。1936年8月更扩大规模，添办初中。这个时期，巴蜀学校的办学成绩得到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高度评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自颁赐“成绩斐然”的匾牌。

第一节 出资出力 筹建新园

1929年底，王缙绪先生筹备创办巴蜀幼稚园。它的产生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寄托着创办人王缙绪先生“教育救国”的理想。

1931年9月14日，重庆《新蜀报》刊载消息：“巴蜀幼稚园校舍行将竣工，来春即可招生。”内称：“此间王治易师长，鉴于本市贫苦儿童，苦无读书机会，以致基本教育失掉，将来难成良民。特为救济贫苦儿童失学，辅助社会教育计，始

购置新市场旧址张家花园地方，创办巴蜀幼稚园。新建园舍行将竣工，大约春来即可招生”。这是重庆媒体第一次关于巴蜀幼稚园的正式报道。

一、顺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1929年的重庆，面临历史发展的机遇。2月15日，中央批准重庆设立省辖市，重庆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自此有了较大推进。设市前后的几年间，重庆大力修建新市区，扩建马路，城区的自来水、电灯、公共汽车等基础设施陆续开始建设。但是，地处西南一隅的重庆教育卫生文化事业，仍远远落后于沿海地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令社会有识之士担忧。

据统计，1929年重庆市仅有公立学校五所，学生1270人，其余则为私立学校。不仅远远落后于江苏、浙江等教育先进地区，连满足百姓子弟读书的需要都不行。1929年重庆市政府成立之后，重庆市区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四川省教育厅的有关文件指示下，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有了发展的转机。重庆一批有识之士呼吁重视基础教育，并先后投身到创办私立教育事业中来。幼稚教育是整个教育系统的基础，幼稚

教育落后，必然影响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的进展。

1929年3月在重庆市召开的二十一军教育会第六次会议上，会员马若兰恳请实行大学院令，即“于各地普设平教幼稚园，并指定专款为基金，令各地女子师范附设幼稚师范班等”。提案到会立即引起讨论并获得支持。于是，刘湘通令“根据第六次教育会议决案，各县教育局自行筹款，由各县女校及幼稚师范班拟具办法，各局长一体遵照办理”。此项命令要求政府出面兴办幼稚教育。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厉行义务教育，限20年内“使全国学龄儿童都受四年之义务教育”，并拟定义务教育实施方案予以推行。同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私立学校规程》，鼓励支持私人办学。自此，全国各地私立学校兴办发展极为迅速。1929年10月12日，重庆大学在菜园坝杨家花园创办并正式行课，刘湘担任校长；同年，四川省立女子初级职业学校在重庆通远门内后宫街开办；卢作孚先生创办私立兼善中学，校址在北碚平民公园内；1929年冬天，王



缙绪先生购买张家花园创办巴蜀幼稚园。据统计，1929年仅市区的19所普通中学中，有11所为私立，占69%。

二、寄托创办人“教育救国”的理想

巴蜀学校的创立，不仅顺应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寄托了创办人王缙绪先生“教育救国”的理想。

王缙绪（1885—1960），字治易，号屋园居士。1885年农历五月初九出生在四川省西充县观音乡大礅磴村。王缙绪曾受业于举人，后考取秀才。1906年赴省参加乡试途中，恰遇新军在顺庆府（今南充）招考学生，乃投笔从戎，从此投身行伍。

1906年，王缙绪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就学于炮科；1908年毕业后在新军第十七镇第三十三混成协担任见习排长，历任连长、营长，驻扎成都西校场；1910年参加保路同志军，投身辛亥革命；1920年兼任永宁道川南道尹；1924年兼任成都市政督办；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1军第五师师长，1928年9月改任第二师师长，驻扎重庆；1931年兼

任四川盐运使；1932年任刘湘部北路总指挥、第三路总指挥，助刘湘统一四川；1935年10月任国民革命军第44军军长。抗战期间，于1938年1月任第29集团军总司令，同年5月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后曾率部参加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湖滨战役、鄂西会战；1944年改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并参与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等重大战役；1945年2月调任陪都卫戍总司令。1936年2月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中将衔，1940年5月，加任陆军上将衔。1945年当选为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1948年当选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1947年5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副主任，1948年8月任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6月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12月14日在成都起义，后任川西人民博物馆馆长、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60年因病在成都去世，享年75岁。

1929年8月6日，有重庆媒体报道“王缙绪近来对军事态度消极，而有出洋考察建设之意见”。王缙绪先生向记者说：“目前救国之道，首在裁兵，其次开垦边地，兴昌实



业，普及国民教育，此为现在当务之急图者。”他又说：“教育之根本，全在幼稚时代之教育为基础，然以我国而论，迄未本此原则实施，故余决心辞去军职，专赴各国，考察幼稚教育状况，如管理法、教育法、保姆养成法等等，逐一详细研究，俾他日归国，能取他人之所长，补我之所拙，以从事我国国民基础教育之工作。”

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师长的王缙绪为什么要辞去军职投身教育？王缙绪写给刘湘军长的辞职书，回答了这个问题。辞职书原文如下：

重庆军长刘钧鉴，窃职厕身戎武，智力交瘁，言公言私，皆无所谓，既干国之未能，复治身之乏术，追惟往事，良用疚心。辛亥革命，方幸旧物光复，洪宪讨平，复应帝国绝迹，从此永无割据恶习，然后遂我初腹，游学欧洲。乃国事屡变，汔无宁日，川省内争，因之益烈，率子弟以攻父母，激兄弟而为寇贼；城乡荼毒之惨，箕豆相煎之酷，频年耳不忍闻。加以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募兵拉夫，壮丁几尽，百物为之昂贵，人工因而飞涨；百孔千疮，万事废弛，学校等于虚设，政

治已入麻醉，有消耗而无生产，见军队不见人民，人人痛恨军阀，学生挺而走险。故……乘我弱点，骋其野心，以买吾国学子，以为前驱而作奴，于是……，流毒环宇，空穴来风，实由万恶军阀造成。去岁北伐成功，国府统一，以为民国彻底，民庆来苏。今乃浙桂交哄，朱纓陈兵，直鲁之风烟四起，滇黔之战云密布。吾川正以兵多为患，民不聊生，内弭重灾，外问国事，此其时矣。深信钧座苦心，提师东下，安内攘外，以顺輿情。孰意川人鼠目，长于内争，时至不行，徒残同类，大难方长，伊于胡底，谁实为之，至于此极。夫血战终身，虽军人方尽职责，然非争国防与外交，牺牲者究何所为，长此屠刀在手，自杀宁有已时？故全国多一军人，即全国添一乱机，川军多一退伍，即川境增一良民。缙绪不幸，误入军籍，当此军阀末路，忍再作茧自缚？年逾不惑，时弗再来，觉悟嫌迟，改过宜勇，曾经迭次陈情，因防移迁循，未蒙钧座鉴察。殊知时潮起伏，川省特多，俟河之清，事不可能。今部队已改编就绪，保用允称得人，且近接绾毂，游刃匪袭，

所有第二师师长职，拟恳以副师长潘文华升任，所遗副师长职，拟恳以参谋长王士升任。俾职暂卸仔肩，游学欧美，此日鸿飞虽远，仍在覆载之中，他日虎帐需人，再作涓埃之报，是否有当，伏候巽裁，临电悱恻，不知所云。职王缙绪叩灰。（原载1929年5月18日重庆《大中华日报》）

王缙绪发表辞职信，公开表达他辞去军职拟投身教育挽救国家的理想；而王缙绪先生教育救国理想的形成，与他的出身和经历是分不开的。

王缙绪的父亲是当地一名中医，母亲王陈氏，中年生下王缙绪，在弟兄中排行第三。其父因病去世较早，遗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母亲和王缙绪的两个哥哥下地劳动，但坚持供王缙绪读书学习。王缙绪曾受业于举人，后考取秀才。他一生爱好三件事：书法、绝律及收藏，1926年曾加入海上亭云书画社，是早期成员之一。

王缙绪的家乡四川西充县，是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地方，素被称作“菖国”，十年九旱，“即在丰年，富民无尽食白米之家，贫者更

数月不得白米一食”。但是，这里的百姓却世代崇尚“有书不读世代愚”的信条，县人以办学养士为荣，士子以教书育人为荣，官吏以振兴诗文为荣。“崇教尚学”成为当地百姓的社会心理。王缙绪先生不仅深受家乡信条的感染，而且他本人就是因为读书而改变了个人命运，走上了不同于他的乡人、先人的生活道路。其家乡西充县评价王缙绪是“出身贫寒，发奋读书，终成大器的近代西充读书人的杰出代表”。

王缙绪先生一生有许多事迹被载入史册，如率军出川抗战，浴血疆场，是具有高度民族气质的抗日将领。创办巴蜀学校、巴蜀学校西充分校，改变地方落后教育，造福百姓后代，培养无数英才。1935年力主中央军入川，促成四川与全国统一。在兼任成都市政督办和四川省政府主席期间，大力推行新政，改革税制以减轻百姓负担，公开财政并严厉惩治贪官污吏，不拘一格起用新人，口碑流传至今。1947年5月，因抵制内战而拒绝担任首都（南京）卫戍司令部总司令职务。1949年12月组织维护成都治安秩序促成成都和平解放，使人民生命财



产免遭涂炭。建国后，他将毕生收藏捐献国家，保存了一大批人类优秀文化遗产。而创办巴蜀学校，尤其为世人所称道。

在创办巴蜀学校之前，王缙绪先生曾有过倡导教育和兴办学校的经历。1920年王缙绪兼任永宁道川南道尹，曾会同卢作孚在泸州兴办过国民教育学校，创办了民俗教育馆、图书馆、体育场等民众教育设施，还资助学生到欧洲留学。1925年至1928年王缙绪驻守资中期间，亦曾办学兴教。

王缙绪首先在资中重龙山下设立了一所县立小学，聘请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前往任教；又将东门外的农业学校改为职业学校，在学校内附设民生工厂，学生半工半读，使贫家子弟都能入学。1926年，他报请省政府将资州中学堂升格为“四川省立第六中学”，聘请周能泮担任校长。这所中学聘请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大学的教授，以及美、英、日等归国留学生担任教员，还到上海购买了大量物理、化学、生物等图书以及教学仪器。“四川省立第六中学”主要招收资中、内江、井研、仁寿、资阳等五

县的学生，为当地培养了无数优秀人才，如范长江、曹荻秋（当年用名曹聪）、廖昂等均为该校早期学生。与此同时，王缙绪将资中“劝学所”改为“教育局”，统一管理全县公、私立学校。又将县政府前面的西仓库让出来，创办“通俗图书馆”，藏书达一万多册，受到当地青年、民众的喜爱，留下甚佳口碑。

王缙绪先生在《巴蜀宣言》中说，“不容讳言的，我国文化思想没有激进的缘故，教育没有长足的进步。更不必讳言的，巴蜀因为地理上的关系，在教育没有长足进步的我国里，不能站在最前线上。”可以说，创办巴蜀学校是王缙绪先生一直致力于教育救国理想的延续。他创办巴蜀学校的目的，就是要改进落后的地方教育，希望通过办教育挽救国家改变命运。

当时，王缙绪先生的辞职报告未获刘湘军长批准，但对其决心投身教育的举动，刘湘给予了理解和支持。1929年冬，王缙绪开始实施创办巴蜀幼稚园的计划，刘湘军长第一个出资捐助巴蜀幼稚园修建园舍（即“湘院”），并向国民政府举荐并经财政部1931年5月4日任命王

缙绪兼任四川盐运使，以为挽留。

三、购买张家花园修建园舍

1929年底，王缙绪以四万银元购买张家花园，作为巴蜀幼稚园园址。张家花园位于通远门外观音岩下，占地约100公顷，是逊清时的园林。主人原姓张，故名张家花园。民国初年卖给重庆“德生裕”钱庄的老板魏翊丞，易名“怡园”，但一般人仍称张家花园。魏翊丞曾捐过知县，署理湖北巴东，后来担任过重庆商会会长，办过红十字医院，在重庆颇有名气。当时，张家花园周围都是坟山，但园内竹木丛生，有亭有廊，时有游人来此散步游玩。曾有人著文描述张家花园的境况说：“城中裘马少年，迭色征歌，时来园中，饮酒博弈，流连荒忘，夜以继日，园主人坐擅其利而已，毫无功德可以称述，这就是张家花园的真面目。”

1927年重庆成为特别市，市区开始逐步扩大，兴建马路，将通远门外自明清时代留下的四十三万余座荒冢通通铲削平除，将其辟为新市区，到1928年市区范围较原旧城区扩展约一倍。三个主要扩展的区域，一是长江沿岸由南纪门向上游

扩展到菜园坝、黄沙溪、鹅公岩一带；二是嘉陵江沿岸向上扩展到大溪沟、牛角沱、李子坝、化龙桥一带；三是在通远门、七星岗向西扩展到两路口、浮图关。1929年2月15日，重庆正式设为省辖市，又继续扩展城区范围。

在这几年市区扩展的施工期间，由于交通不便，张家花园的游人减少，园内显得分外冷落。张家花园内有一座小洋房，名春晖堂，园主人魏翊丞偶尔来此小住，因其搬到乡下去居住，此时也朽败了。张家花园由于无人照管，园内花木凋零，蔓草丛生，逐渐荒芜废弃。1929年冬天，经人介绍，王缙绪买下张家花园，并开始巴蜀幼稚园园舍修建。

1930年秋，巴蜀幼稚园园舍陆续开工建设，当年年底落成的是刘湘捐建的“湘院”，这是巴蜀学校的第一座教学设施。1931年9月，幼稚园又新建成了膳堂、厨房等园舍，巴蜀幼稚园配套设施基本完善。

巴蜀幼稚园在建设期间，得到重庆市政府的支持。“湘院”背后坡地地势倾斜，“而附近的居民牧猪放牛，遗矢撒尿，污水交流，秽臭四塞，对于学校卫生大有妨碍”。

于是，巴蜀幼稚园向重庆市政府请求，将校园背后的坡地划归巴蜀幼稚园，以便统一规划建设。经过实地勘测，重庆市政府同意将该地划给巴蜀幼稚园管辖，后来由巴蜀幼稚园将其改造成为园林。

此外，王缙绪先生在修建园舍的同时，沿张家花园平街还修建了八座西式民房，形成围墙令幼稚园与外界隔开，以保安全。这八座西式民房均为独立院落，专门用以出租，所得租押金，全部作为巴蜀幼稚园开办后的常经费。王缙绪为新建的西式民房分别取名“菁园”、“莪园”、“朴园”、“械园”、“可园”、“宜园”、“亦园”、“怡园”，并亲自题写了园名。“菁莪”、“械朴”均取自《诗经》。“菁莪”为《诗经·小雅·菁菁者莪》篇的简称，旧时引用“菁莪”典故，皆喻教育人才。“械朴”则是《诗经·大雅》的篇名，意谓用人有方，人才众多。

四、约集社会人士共襄盛举

王缙绪创办巴蜀幼稚园的举动不仅得到刘湘军长的支持和捐助，一批社会有识之士亦纷纷襄助，王缙绪遂将他们纳入发起人组织，共三十三人，他们是：

王缙绪	潘仲三	唐子晋
蓝绍倡	范绍增	李鑫五
魏翊丞	吴受彤	甘典夔
曾子唯	傅友周	石体元
陈怀先	赵资生	曾禹卿
汪云松	温少鹤	张茂芹
康心如	周宜甫	李奎安
王兰辑	孙树培	黄元贲
汤子敬	魏瑛珊	魏丽琳
魏寿萱	魏昌琦	魏昌琳
陈丽生	连式之	连雅各

在这三十三人中，有当时的重庆市市长潘文华（潘仲三），第一师师长唐式遵（唐子晋），第三师副师长范绍增；有商界人士汪云松、温少鹤、张茂芹、康心如、周宜甫、李奎安、傅友周；还有张家花园原主人魏翊丞及其子女魏瑛珊、魏丽琳、魏寿萱、魏昌琦、魏昌琳。

发起人组织后因改办巴蜀小学校而自动解散，其中部分人员成为巴蜀小学校董事会成员。

第二节 汇聚英才 始发《宣言》

巴蜀幼稚园计划于1932年春开始招收儿童入园，因苦于没有聘请到理想的校长而迟迟没有开学。董事长王缙绪通过卢作孚、黄炎培先

生引荐，从江苏省礼聘周勛成先生入川，担任巴蜀学校校长。周勳成校长为巴蜀学校带来了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成功的新教育实践；巴蜀学校也因为周勳成校长的到来，成为西南地区实施现代新教育的重要窗口。

1932年8月，周勳成校长到达重庆并立即投入筹备巴蜀小学建校工作。经过七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完成了巴蜀学校教育思想、教育人才、教育组织的准备，奠定坚实的巴蜀学校办学基础。

筹备阶段的主要工作包括三大事项，其一是发表了《巴蜀宣言》，其二是公开征聘教师，其三是研究确定巴蜀学校教育目标和教育原则。

一、周勳成校长入川

1. 卢作孚、黄炎培推荐校长

巴蜀幼稚园于1932年春筹备就绪，准备于2月开始招收儿童入学。1932年1月18日，重庆《新民报》刊登消息：“二十一军王治易师长对于教育事业素极热心赞助，去年为救济贫苦失学儿童创办之巴蜀幼稚园，建修校舍动工已久，现即将落成，内部设施颇为完善。闻王氏已定本年二月内开学，并免收学生之

书杂等费用。”由于张家花园地处偏僻，且交通不便，更主要的是所物色的校长均不符合王缙绪办学的理想，幼稚园迟迟没有开学。于是，王缙绪找到卢作孚先生，请他在教育历来先进的江苏省聘请一位专家来执掌巴蜀学校。

卢作孚先生曾与王缙绪多次共事，1920年王缙绪兼任永宁道川南道尹时，卢作孚先生担任永宁道教育科长，在川南推行通俗教育活动；1924年王任成都市政督办时，卢创办了成都民众教育馆；后来又同在刘湘手下共事。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改进地方教育的共同愿望，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巴蜀学校创设后，卢作孚先生先后出任巴蜀小学董事会董事、巴蜀初级中学董事会董事、巴蜀文商学院董事会董事，是巴蜀学校发展过程中始终如一的参与者和组织者，为巴蜀学校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应该说，聘请周勳成先生执掌巴蜀学校，为当年落后闭塞的重庆引入了江苏等沿海省市的先进教育理念；而聘请周勳成先生入川，也是卢作孚先生实现他在重庆推行“现代化建设”理想的步骤之一。